



困境与抉择：论查建英的留学生文学书写

**Dilemma and choice: A study of Zha Jianying's overseas students
literature**

吴雪俐

ENG SHER LEE

16ALB06750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19**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5
第四节 研究资料	8
第二章 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鸿沟	11
第一节 第三世界之建构与三次留学潮	11
第二节 资源条件的匮乏与追求	14
第三章 源根与恋人：历史记忆符码	18
第一节 民族血缘与历史记忆书写	18
第二节 中国与美国，爱情与婚姻	20
第四章 文化失落——源根与异乡的拔河	24
第一节 对异文化的迷茫、排斥与接受	24
第二节 文化失落：悬荡于双重世界的夹缝之间	28

结语-----33

引用书目-----35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吴雪俐 ENG SHER LEE

学号：16ALB06750

日期：2019年8月9日

论文名称：困境与抉择：论查建英的留学生文学书写

学生姓名：吴雪俐

指导教师：余曆雄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查建英作为二十世纪 80 年代留学生文学的先锋，其作品通过赴美留学的主人公的遭遇，辛辣地反映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物质鸿沟，以第三世界居民的视角自我审视，深刻地折射中国社会内部的自卑心理。在查建英笔下，爱情与婚姻不仅用以勾勒留学生的受挫经历，更跳脱人物形象塑造的框架，进一步升华成富含历史记忆与家国蕴意的符号，凸显留学生与民族记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异域文化与家国记忆的的双向拉扯力，使他们面对精神家园的解构，产生文化认同的焦虑与裂变，不断游移在源根与异乡之间，成了双重文化、双重世界间的流浪者。本文以查建英的留学生短篇小说为切入点，通过社会历史批评，对留学生与社会变迁之相互关系进行探讨，以此剖析留学生所面对的生存困境与三波留学潮之相互作用。同时，通过文本内容的集中分析与文化认同的观念运用，论述查建英的留学生小说之特色，及其笔下角色在美国梦的追逐与失落中所面对的文化身份之危机。

【关键词】 查建英、留学生文学、文化身份、第三世界、家国记忆、身份焦虑

致谢

随着论文的完成，意味着学士课程的三年攻读也来到尾声。在论文的撰写期间，对于不吝给予帮助的各方——家人、朋友以及导师，笔者在此致以无尽谢意。

学士课程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家人的支持与协助。他们在这三年来给予笔者的种种支持与包容，笔者铭记在心。同时，在学期末的尾声，面对论文、报告的压力，因为有了身边的同学与朋友们的意见与鼓励，提供笔者不少看法与视角，让论文能够顺利完成。

同时，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论文导师余曆雄师由始至终的指导与赐教，更是给予笔者极大帮助。余曆雄师在选题、内容筛选、论文分节与以及最后的修改阶段，都不厌其烦地指点笔者，提供许多精粹切要的意见，助笔者顺利完成了论文。

在此，笔者向各方致以万二分的谢意。

第一章 绪言

二十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东西文化产生激烈碰撞。成千上万学生离开中国到国外留学，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留学潮。“近现代中国留学运动有高涨期和低迷期，它们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波动相呼应”（叶维丽，2012：8）。查建英的留学生文学集中描写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其笔下留学生经历了文化革命、反右运动的全面冲击，体验了物质条件匮乏的乡野农民生活。出于对当前生活状态的不满、或出于对更高的自我价值的追求，他们毅然选择出国留学，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

写作之于身处异域文化结构的华人而言，是“串联他们过去（历史、中国）和现在（当下、美国）的重要手段”（陈薇，2009：119），以汉语创作的留学生文学或可看做是留美作家用以强化身份认同、坚定民族意识的行为，留学生文学由此而产生。留学生文学是“关于知识分子出国生活信息的语言艺术表达”，“以研究出国游学人的文学创作以及文艺思潮、文学运动为主要内容，也探索中国人走向世界时的精神活动轨迹”。王少杰强调，无论此类作品的作者是否留学生，以“关心留学生活”为作品主要信息，是此类文学的前提（王少杰，2005：50）。

查建英自大学时期即开始写作，在北大求学时创作了〈最初的流星〉等短篇小说，并在 1982 年留学美国，先后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就

读。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约 1987-1989 年），她随即开始集中创作留学生文学作品（河西，2014：30）。其短篇小说〈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等获得广泛回响，成为一鸣惊人的代表作。查建英在小说中刻画了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矛盾，包括求学打工的磨炼、爱情婚姻的挣扎。文本中的留学生在中国（源根）与美国（异乡）之间载沉载浮，既无法融入异乡，又无法抛下过往，由此产生文化认同与身份定位的迷失与裂变，徘徊于双重世界的夹缝间，成为无根悬荡的边缘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现当代留学生文学虽早在清末已渐涌现，但发展仍稍显稚嫩，至今尚未建立起一套全面的、针对此类文学而设的完整研究体系，相关著作也较为少见。留学生文学热潮的兴起始于 1988 至 1989 年间，已有不少相关作家与作品，但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是中国近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人系统研究过”（唐翼明，1989：85）。留学生文学“整体上还没有形成明晰的史学意义上的概念内涵共识”，且由于移民文学、世界华人文学与留学生文同以流散异域的华人精神轨迹与生活状态为主要描写对象，故不少研究仍把此三类文学混同一谈（王少杰，2005：50），研究上仍有不少空间可供挖掘。

此外，多数学术著作研究都倾向于针对台湾作者的文学作品，如白先勇、於梨华、张系国，针对中国作者的研究则相对少有。查建英在中国属于较早期

发表留学生作品的作者群之一，与苏炜等人被认为是开启了留学生文学之先河的先锋，突破了此前中国留学生文学的一贯内容¹。她的作品必然有其代表性，对后来兴起的留学生创作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作用²。故笔者欲针对查建英在小说中所描写的留学生精神状态进行探讨，剖析留学生在异乡面对求学、打工、情感问题的折磨，从而折射他们处于不同文化、双重世界的夹缝之间的边缘人状态。由于关注不多，资料相对少，可供研究的部分尚存，却也成了本文研究的困难之一。此外，由于查建英本人同为留学生，故笔者欲探讨其作品之内容与其真实经历是否完全一致，读者能否在作品中发现作者本人的影子。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虽与新移民文学、离散文学等同样着重于描写散居海外的华人生活，但相较之下，留学生小说相关的研究称不上丰硕。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六卷本《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较为系统性将近现代留学生文学作品按照文体内容、地区、时间等要素做了梳理，收录了许多颇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惟体裁有所局限，多以小说为主。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在第四卷收

¹80年代左右的“新移民文学”多由一群身处海外工作或读书的中国人在谋生、上学之于写就的。由于外语掌握不足，或生活在当地的华人圈子里，他们对当地的社会人情和文化的体验与思考深度不足，“往往就成了一边走马观花地看西洋景，一边写思乡情、游子心”的、以浮浅匆忙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文学作品。相比之下，查建英在1987年回国后所写就的作品加入了更多元的视角，描写了不同民族同在美国的经历，主角也并非全然以中国人为主（江少川，2014：77）。

²查建英的作品对中国留学生“美国梦”的追寻与失落刻画得极为深邃，1991年的《北京人在纽约》与2003年出版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则是更进一步的、在美国追名逐利的故事。李陀阅读查建英的《头版新闻人物》和《丛林下的冰河》后，向查建英表示他原来不太看重留学生文学，如今由于查建英的加入，分量就不一样了，留学生和多内的写作也有了一种新的关系（江少川，2014：77）。

录了美国华文文学，其中涉及了中国留美生体裁相关创作。萧文轩在《20 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提及查建英的留学生文学创作，并针对留学生身处两种文化间的挣扎做了剖析。宋晓英的《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亦对於梨华的“边缘人”之概念阐发其独特见解。《台湾小说发展史》展现了古继堂对留学生文学的重视，但仍无系统性的剖析。《台湾新文学史》中，陈芳明则介绍了台湾留学生文学。

杨启平于《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一书中进一步缩小范围，将研究对象着重在女性，并于第二章〈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中的文化身份的追寻和迁移〉中提及异国语境下的女性书写，其中就囊括了留学生文学。《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中，黄万华于第六章第三节中以留学生文学为一种文学现象并加以论述。林润主编的《华人的美国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所收录的虽是范围更广的“美国华人文学”而非“留学生文学”，然其作品皆“以美国社会和历史为背景，美国文化为画面”（林润，2007：7），且多有以留学生为主角、描写留学生生活的小说。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提出“无根与放逐”的论点，针对张系国、白先勇等人多品进行论述，但无明确指出“留学生文学”之概念。辛金顺《中国现代小说的国族书写——以身体隐喻为观察核心》一书以身体书写解析留学生的文化之挣扎。

论文方面，黄万华的〈故土和本土之间的叙事空间——美华小说的历史和现状〉中论述了留学生文学中故土的“非领土化”倾向。向忆秋的〈想想美国——旅美华人文学的美国形象〉针对台湾群体的文本进行剖析，论述其身份认同所遭遇的挣扎。在〈留学生文学中“他者化”角色的文化阐释〉一文中，谢昉则更为强调留学生的文化主体性，打破西方中心论。杜霞在〈从留学生到新移民：

身份焦虑与文学计划论》中跳脱文化视角，认为身份焦虑更多来自于评论界而非作家本身。〈台湾留学生文学到移民文学的发展近况〉、〈七〇年代台湾留学生小说析论〉、〈白先勇离散文学创作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皆针对白先勇、於梨华、张系国等作家的作品进行进一步论析。尹雪智的〈文化身份叠合下的自我认同——於梨华小说研究〉从生命意义与身份认同的矛盾出发，探讨自我认同。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留学生文学的创作内容主要以描述留学生的异域生活体验与精神轨迹变化为主，但不同作者所构筑的留学生生活基调各不相同，单一作者的作品并不能概括所有留学生文学的特征。大体而言，其内容应囊括：一、留学生创作的直接反映留学生活现场实际的作品；二、类留学作家的文学作品；三、记载早期留美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以及反映海外留学生归国创业的纪实文学等（王少杰，2005：53）。孙慰川将留学生定义之范畴进一步扩大：凡是以求学海外的华人所经历之种种事件与心态为主要描写内容者，无论创作主体是否华人、创作语言是否中文，皆可纳入华人留学生文学的创作范围（孙慰川，1994：48）。

查建英的留学生文学作品以“较早赴美留学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美国梦追寻以及在追寻中的失落”为主要描写内容，刻画的是“在浪漫主义的理想追寻中与美国的现实发生强烈的冲突”从而导致的理想失落（默崎，2017：63）。部分留学生作品表达了华人知识分子对美国异质社会的极度排斥，极力刻画他

们处于异域文化中，在日以继夜的折磨中泯灭了自我³；或以政治定位为主线，探索异域华人知识分子在现实利益与家园情结之间的权衡⁴。然而，查建英笔下的人物少有明显的政治印记，对美国文化也并不排斥，反而如鱼得水，对美国文化的融入鲜有阻碍。他们与美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和对峙隐于无形，却一直存在着，直至经过岁月积累而爆发后，通过美国梦之寻求与失落的前后差异，才揭开了留学生的内心矛盾与文化认同的焦虑。故本文研究将专注于查建英的留学生文学作品，不能代表完整的留学生形象，更不能以此概括宏观的留学生文学。

本文将以查建英的留学生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丛林下的冰河》与《留美故事》、《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所收录的短篇小说为例，从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生活的日常作息与心理状态为出发点，探讨其从第三世界来到第一世界所面对的资源条件差距，以及生活在祖国故乡的历史记忆以何种形式残留在留学生的精神中，以至于影响他们的一切生命选择，乃至铸成看似既定的悲剧。接着，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剖析游荡在双重文化与国度之间，试图扎根异国以取源根而代之，却无法脱离过去的历史记忆，以致文化认同产生分裂的留学生之心态。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建构自我认同的核心，“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王宁，1999：49）。对自身的民族文化与社会习俗表示肯定的价值判断，是建构身份认同的一大前提。“认同”（identity）使人通过“祖先、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

³ 白先勇《芝加哥之死》的吴汉魂、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牟天磊，同样与美国文化格格不入，为了获得学位而牺牲了原乡的感情联系。

⁴ 张系国《割礼》、《昨日之怒》以钓鱼岛的权利纠纷为主线，描述留美一批知识分子所展现的各不相同的政治立场。

体制来界定自己，在种族集团、宗教社群、民族身份以及最广泛的文化层次上认同文明”（[美]塞缪尔·亨廷顿，2002：6）。文化认同建立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的基础之上，使主体对特定族群或文化产生归属感，自觉属于该群体中的一员。文化认同可分为三种形式，即经验主义的身份认同⁵、功能主义的自我认同⁶、现实主义的价值认同⁷（邢媛，2017：102），本文所提及的文化认同即属“现实主义的价值认同”此一领域，倾向于以社会认同/集体认同为基础，研究人作为个体，对特定文化或社群所产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及其从中获得的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邢媛，2017：106）。

文本中的文化身份之焦虑与裂变和中国的大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三波留学潮的诞生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发展变迁亦紧紧相扣，文化身份的裂变会随着留学生所经历的社会、文化之变化而产生。故本文将引用社会历史批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并分析文本。社会历史批评着重于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乡情乡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王先霏，1999：69）。丹纳认为文学是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司各特编著，蓝仁哲译，1983：62），文学不能凭空依存，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留学生文学正是在时代与环境的交织作用下产生的、具备鲜明时代印记的文学（王先霏，胡亚敏，2005：68）。在理解留学生文学之前，有必要深入探讨文学写作的现实背景因素。

⁵ 经验主义的文化认同“以启蒙理性为基础，以理性主体通过为自身立法而产生道德律令为判断标准，只要我们的行为符合自我内心的命令，就意味着获得了自由”。其注重的是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和身体性的思考，认为“理性主体所拥有的的尊严，赋予人类特殊的优越性和责任”。（邢媛，2017:102-103）

⁶ 功能主义的文化认同“把认同看成是一个心理过程”，其代表为弗洛伊德，他认为文化认同等同于自我认同，将认同的建构视为一种心理过程，是“个体一句个人经历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邢媛，2017:102-103）。

⁷ 现实主义的文化认同“强调文化认同的共识性和价值认可性”，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组织之中，存在于人类文化的整合过程之中，与人类文明、文明发展的过程伴随而生，是人的现实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邢媛，2017:105）

论文分为五大章节，第一章将确认留学生文学的定义与范畴，解释其发展趋势，并叙述查建英的留学经历与写作背景。第二章节将分为两小节，集中论述 80 年代身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与第一世界的美国，探讨小说所建立于其上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为查建英留学生文学的国家历史背景做大致的梳理，以为接下来的章节做铺垫，以理解三次留学潮的形成之原因。通过比对留学生在国内与国外的生活状态，探讨社会资源差异如何使留学生奋力追逐查建英所构筑的美国物质神话。最后，结合查建英本人的留学体验，针对其留学生写作与真实留美经历之矛盾，探讨现实与文本的关系。

第三章节主要讨论“爱情”与“情人”在查建英留学生文学中的意象之作用。第一小节论述留学生文学中的历史记忆书写，探讨留学生与国族的内在血缘之联系。第二小节论述文本出现的恋人与爱情之描写的升华。同时，从查建英的写作时段出发，探讨其写作视角与语境之差异。第四章节进一步论述留学生初至异国，面对截然不同的环境、社会与文化，迎接种种生活思想上的挑战和冲击，采取何种措施。第二小节则分析留学生处于双重世界的夹缝中所面对的民族文化的剧烈挣扎。第五章将依据上述研究论点做出总结。

第四节 研究资料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笔者参考了不同的文学作品、专书与论文。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留美故事》等小说集提供了笔者大量查建英的早期留学生文学作品以作参考。为进一步了解查建英对于

八十年代的个人看法，笔者也参考了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叶维丽的《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也针对中国近现代的数次留学潮做了严谨的剖析，对于拓展论文视野颇有帮助。容闳所著《西学东渐记》提供了早期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生活之相关资料。此外，林润主编的《华人的美国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收录了多元化的旅美华人之文学作品，囊括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美国华人生活，提供不同视角。王德威的《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在叙述近现代中国小说发展趋势方面提供了清晰简明的介绍，其中提及留学生文学的发展。周宪在《文化研究关键词》与《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中关于身份认同的解释对笔者在论述留学生的身份焦虑时颇有帮助，也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定义与论述。《翻译与跨文化操作》一书针对留学作为跨文化翻译之行为，提供了详细叙述。为了铺展留学生的写作背景，笔者亦参考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外交政策与策略》、《中国近代史》等相关书籍。为了确认研究方法，王先霭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与《文学批评导引》提供了文学批评的相关资料。

论文方面，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的生存困境〉对美国（第一世界）与中国（第三世界）之间的对峙提供了精确的论述。此外，刘俊的〈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亦对查建英小说中的历史蕴含进行了探讨。朱美洁所著〈跨文化语境下 20 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形象研究〉与刘杨的〈论中国大陆留学生文学的主题嬗变〉两篇论文亦在梳理近现代的留学生文学的形象与主题之发展变迁方面提供了笔者不少帮助。朱贝特于〈新移民文学婚恋题材小说论〉论述了女留学生在异国语境下的婚恋观之体现。王少杰的〈留学生文学：定义和区分〉对留学生文学提出了确切定义。

唐翼明在〈一个“留学生文学”热正在兴起〉中记载了留学生文学的兴起之始末。余建华的〈国外“边缘人”研究略论〉与王亚丽〈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论北美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写作〉提供了边缘人一词及边缘状态之阐释。〈美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与身份认同〉从空间形式的角度对身份认同加以论述。〈二十世纪留学生文学的家园情节〉则以“母体情结”看待留学生的家园情结。

为进一步理解留学生文学，在细读查建英的作品之外，笔者亦阅读了其余作家的相关作品，如於梨华〈雪地上的星星〉、白先勇〈芝加哥之死〉、张系国〈割礼〉等，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提供多重视野，多方面看待留学生文学。

第二章 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鸿沟

查建英笔下的角色之所以选择留学，有者是凭一时冲动，也有的角色是因为深刻体会了资源匮乏给生活带来的种种障碍与绝望，为了更高素质的生活追求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因而毅然选择留学。故，他们的出国留学之选择与当时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状态不无关系。这些留学生在异国留学、打工、生活的过程中，都不约而同体验了两国的资源条件的差距所带来的精神与价值观之冲击。

第一节 第三世界之建构与三次留学潮

历代以来的留学生文学中，中国往往被描述为相对落后封闭的第三世界，美国作为发展蓬勃、经济繁荣的第一世界，则是留学生实现理想与自我价值的踏脚石，二者形成悬殊对比。中国的社会环境条件促使留学生展开对国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使他们以留学为名出走他国，离开了源根和母体文化，形成一批又一批的留学潮，查建英的留学生小说即诞生于第三波留学潮。在探讨查建英的小说之前，有必要对此前一脉相承的留学潮进行梳理。

近现代的中国留学潮主要可分为三次，第一次出现在十九世纪 70 至 80 年代洋务运动炽烈发展之时。彼时西学大盛，为了师夷长技、强兵富国，清政府在 1872 至

1881 年间派遣了一百多名年幼学童前往国外留学，但这项计划很快就夭折，学童亦被遣送回国。此时的留学生文学作品较为少见，其中有容闳著于 1900 年的《西学东渐记》，记载其作为早期求学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极少数中国留学生身处异域的求学经验，不乏他作为知识分子，面对祖国日渐腐败的感慨：“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容闳，1981：22）值得一提的是，当初清政府派遣的一百多名留美学童，其副领队正是容闳。

第二波留学潮集中在 20 世纪早期，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外生活的挖掘和体验，开始涌现了大量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包括老舍、鲁迅、郁达夫等人所创作的〈沉沦〉、〈藤野先生〉、〈二马〉等。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大量知识分子纷纷留学美国、日本、欧洲。此时的文学作品以浓厚的乡愁与爱国意识为主题，“借助异域文化重新审视故国传统”，集中表现思乡忧愁与受辱之郁悒（刘杨，2002：7），充满激昂愤慨的爱国情操。这不仅“显现留学生个人的价值抉择，也暗指了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王德威，2012：247）。除了游子乡愁的描写，更多的是在异域饱受压迫和羞辱，期求祖国富强的民族精神与政治忧患意识。王德威认为此一时段的留学生小说“上承晚晴留学小说的遗绪，下开六、七〇年代白先勇、於梨华、张系国等人新留学生小说的先河”（王德威，2012：246），是留学生文学发展重要的一环。

第三波留学潮则爆发于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各类留学生文学相关的创作源源不绝，“留学生文学”一词也在这段时期正式提出⁸。此前的 50 年代末至 70

⁸ 1987 年 6 月 21 日，晨边社在纽约举行成立后第一次讨论会，主讲人于仁秋在开场白中表示“留学生文学”一词是晨边社数位发起人聊天时提出来的名字（唐翼明，1989：85）。然，据王少杰指出，留学生文学之概念在学术界的传播乃是由广东高校学术界的推荐而始。二十世纪 70 年代，广州王晋民先生所著《台湾当代文学》中，已收录一段专门论述留学生文学的专章，但主要以考察台湾此类文学的发展情况为主。此后中国国内相继兴起《小说界》、《人民文学》等留学生文学相关出版物、以及查建英、严歌苓等相关作家，而 1987 年在北美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的晨边文学社举办“留学生文学”的专题研讨讲座会议，已是后话。（王少杰，2005：50）

年代，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五年计划”经济策略导致国内农村出现严重饥荒，此后又接连爆发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浩劫，严重冲击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中共在反右运动与文革中针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具迫害和压抑意味的政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大大降低，而“刚从文盲状态中摆脱出来的农民和工人被捧成科学家、哲学家和诗人”（R. 麦克法夸尔 编，1998：398）。国内政治氛围的排斥和压抑使他们无处发挥，出国留学便成了逃离当下备受束缚的生活的最佳途径。

80年代初，中国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时代，中西之间的交流再度开始，第一世界美国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留学的首选。在此之前，中国与西方列国往来极少。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十年内，“中国只与苏联即其东欧卫星国保持外交和贸易关系”，与美国“完全没有任何商务往来”，孤立于国际社会（徐中约著，2008：890）。中国打开国门后，与西方列国之间的交流渐趋频密。然此时中国方从长期的内乱中回恢复过来，资源条件相对匮乏落后。在留学生文学中，双方的冲突和对立在异域留学经验所遭受的磨难下更为突出明显。

1974年，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中提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⁹：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

⁹ 1974年2月22日，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见面时，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逢先知，冯蕙主编，2013：520）

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彭远，2017：132）。

中国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皆无法与第一世界比肩，彼时的中国相对于美国，缺乏种种物质资源。

由此，留学生文学所构筑的世界中，中国往往难以从社会封闭、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的形象中逃离。即便是关于“个人情爱的失落、生存的艰难，也归因于国家贫弱的表征”（王亚丽，2019：49）。无论是哪一波留学潮，我们都无可避免地从这些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将中国的形象置于西方列国的语境之时，无论是文化、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中国往往疲弱萎靡。这样的认知必然要对留学生的生活与思想产生冲击，使留学生的价值观产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第二节 资源条件的匮乏与追求

三个世界之说确立了“世界城市”（美国）与“世界农村”（中国）之间的物质鸿沟（钱刚鐔，1983：120）。在第一世界的语境中，第三世界往往被描写为相对落后、疲弱的。当留学生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美国，以第三世界人民的视角体验其繁荣，实际上也诠释了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叙述和理解。然，当他们充分浸润美国式的价值观，回看曾经孕育了自己的第三世界，两者之间巨大的落差使他们对记忆中的故乡形象进行解构，并予以不同视角的重构和叙述。

查建英的留学生书写建立在反右运动与文革的阴影上。为挣脱阴影，他们到国外留学，试图取得更好的资源以实现自我价值。这些出身自资源条件匮乏的第三世界留学生来到美国之后，为了适应并调整异域生活，开始汲汲于物质的渴望和追求。留学生“亲身体会着文明并感同身受地濡染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从而展开“对于故国文化的反思以及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何颖利，2001：16）。在他们的价值观渐渐转变的同时，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的对峙渐趋尖锐。

〈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的伍珍千辛万苦“逃奔”至代表荣耀和机会的美国。她见识过农村的物质缺失与人伦思想的匮乏，并拒绝接受光棍寡妇偷情此类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离开堪称她第二个故乡的陕北村落时，她铁了心不再回来，无不表现她对第三世界的彻底厌弃和失望。她所欲追求的是能提供丰裕物质的工作和生活，出国成了她挣脱当前环境的最佳途径。中国农村“一脸菜色倦容的乡亲们”、“混着葱味汗气的臭屁人气”（查建英，1991：180），与美国“鳞次栉比的时髦商店橱窗”、“贵族阶层的闲逸儒雅”形成了二元对立，尖锐地突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社会与资源条件的差距（查建英，1991：209）。见识到美国教堂那些领免费午餐的穷人、难民、酒鬼和毒虫，伍珍的第一反应是厌弃和鄙夷，深刻意识到她对贫困潦倒的深痛恶绝。伍珍从原本致力于读毛选的知青，转变成美国社会价值观的崇拜者。“作者通过塑造伍珍这个试图摆脱贫穷与落后状况的东方女性形象，把物质丰裕的第一世界对物质落后的第三世界的控制与拒斥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陈薇，2006：114）。伍珍所经历的，正是一个千方百计想成为第一世界的一员，却在过程中渐渐丢失自我的第三世界居民的悲歌。

查建英的“主人公们试图在第一世界的‘丰裕社会’中寻找第三世界的处境所不能提供的一切”，美国生活的丰富资源“变成了查建英的一个巨大的神话”（张颐武，

1989: 28), 使他们以此为中心展开生活奋斗。于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对比被具体化为丰裕/贫困之间的对比”(张颐武, 1989: 28-29), 从留学生的国内外之生活差异、以及最后对其生存状态的改变和突破之中, 两个世界的尖锐对比更显戏剧性。

伍珍为筹学费而开始在歌剧院售票厅工作, 由此构成了美国丰裕物质的神话。在歌剧院展开的是一幅华丽奢侈的上流社会生活画卷, 她为其所吸引, 以自己一夜暴富、“鼻梁增高, 眼睛变蓝……成了一个高贵的美国人”(查建英, 1991: 233)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幻想来自我安慰。以美国人为高贵而以自己为低微, 流露的是民族的自卑心理, 以及背后所代表的第一与第三世界的冲突。要取得加入这个世界的资格, 唯有让自己拥有同样巨大的财富, 而自己东方人的特征成了最大的阻碍。外貌特征是民族的具体表现, 伍珍显然对自己无从掩饰“第三世界居民”的身份感到无地自容, 这自卑来自于贫富的对照, 看似是以第一世界的视角论述第三世界, 实际上却是第三世界的自我审视, 所凸显的正是第三世界居民对本身形象的贬低。

《最初的流星》中, 母亲所挑选的庄重浅灰上衣, 使“我”在西方舞会里黯然失色, 充满土气。伍珍穿上自己裁的红裙子, 在中国引众人侧目, 在美国却无法毫无西方的时髦。她曾奉为经典的语录, 在美国简直不足一提。“对于自己的民族的生存具有迫切意义的一切, 在第一世界中却显得荒诞和可笑”(张颐武, 1989: 30)。当留学生致力于脱离第三世界居民的身份, 停留在过往生活状态是他们引以为耻的。《献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中, 在华语小报社混日子的“我”被朋友责备“万里迢迢跑到美国来还泡在中国人堆里穷混”, 没有脱离中国人“穷”的困境(查建英, 1991: 283)。《丛林下的冰河》的“我”赴美数年后回到中国, 西北肮脏的茅厕、传统的砖房土房, 使“我”极不适应, 中国成了物质上陌生疏离的“他者空间”, 美国才能满足“我”的生活理想(蔡晓慧, 2014: 79-80)。在这样的对峙下, 这些第三世界的知

识分子往往卑微羞愧，由此转变为对第一世界的迷信和崇拜，认同西方文化而排斥中国的柴荣和芬原便是其例。他们所表现的不仅是对物质的追求，更是对美国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的追求——正是国内高度压抑的思想环境与精神的匮乏，使他们将理想寄托于美国。

查建英作为 80 年代赴美留学的先锋，难免使人将其经历与笔下的留学生联系在一起。然查建英留学时获得了数千美金的研究生奖学金，在美国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打工亦非生计所迫，而是“增长人生阅历的一种方式”。她不像其他中国人有民族心理负担，自觉在美国低人一等（河西，2014：33）。由此，她的留学生文学自然不似《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那样流尽血泪的留学体验，反而对美国大都市抱着向往和冲劲。生活坎坷的伍珍倒是她笔下的特例。伍珍是距离她“个人经历比较远的一个故事”，与她的“生活轨迹、追求、情感方式都很不同”，而她本人则隐藏在虚构的男性叙述者背后，以旁观者的视角讲述故事（江少川，2014：77）。伍珍与查建英的生活经历存在差异，她对伍珍的书写，或来自于她本人的经验与中国留学生的一种典型形象的结合，非全然是她本人的经验。查建英的生活压力虽相对轻松，也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没多久的中国摆脱了一穷二白，但物质上仍然非常贫穷，我们都是穷学生，但是觉得美国真舒服啊”，美国快餐对“在国内没吃过多少油水的”他们来说是美味佳肴（河西，2014:33），这种物质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她通过伍珍曲折的留学生活，集中表现了第三世界的自卑与寒酸，凸出两个世界的经济基础之差异，这其中虚与实的并存，是查建英的真实体验与某种程度上的文学修饰效果的结合。

第三章 源根与恋人：民族血缘与历史记忆符码

留学生生活在异域，除了求学打工，也有爱情的点缀。尤其在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留学生小说中，爱情常用于表现留学生所遭受之种种挫折。严歌苓于《雪地上的星星》中所描写的美国留学生罗梅卜，即是为了爱情和婚姻而焦头烂额的典型留学生形象。然查建英的留学生小说中，其主人公的爱情往往跳脱框架，不仅用以建构留学生的异域生活之苦痛，更是经过文本内相互穿插的中西文化对峙与主人公的情感历程，升华成蕴涵历史记忆的民族符码。残留在留学生心中的、对昔日爱情的留恋和寻求，意味着过往的历史记忆之于文化身份的作用力。留学生与爱情的纠葛，也是他们与异乡/故乡之间的纠葛，代表其文化身份面临的危机。

第一节 民族血缘与历史记忆书写

查建英的主人公在国内的生活记忆往往充斥反右、文革的阴影，并在他们出国留学后仍紧随其后，成了甩之不掉的包袱，使这批留学生背负着深刻的民族历史，给查建英的留学生小说附加了与众不同的历史蕴意。

1957年，中国发生反右运动，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奏。为整顿党风、消灭反共的右派人士，许多国人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并予以定罪，国内一时风声鹤唳，人

人自危。运动发展至后期，反右风气越演越烈，做法愈趋极端，上级给每个单位定下反右分子的百分比，以此决定反右分子的人数：“一个单位应有 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R·麦克法夸尔，1998：271）。在这样的体制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被进一步贬低，大量知识分子备受诬蔑并下放农村，最终死于饥荒。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终于发展至极端。经官方渲染的批斗、揭秘行为，致使大量知识分子备受其害，经历了不人道的虐待、殴打与严重侮辱，被杀与自杀者不计其数。

反右、文革的阴影笼罩给留学生带来精神创伤，建构了留学前的国内生活记忆。文本中的留学生提起此类伤痛时往往轻描淡写，不做浓郁着墨，但从其言语之间却可探出伤痛之深。时间与空间的改变并不能使创伤愈合，这些从故土带来的伤痛记忆仍然深植心中，且时不时提醒留学生：自己与故乡仍然存在无可磨灭的内在血缘。

《丛林下的冰河》的“我”随着美国男友捷夫参观美国监狱，向捷夫提起“我”的父亲从前因文革而成了政治犯。然捷夫对文革和政治犯不甚理解，其茫然的反应终使“我”沉默，尖锐地指出“我”和捷夫之间的差异，在于各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历史记忆的根本性之不同。于“我”而言极其惨烈的文革，在捷夫那里却成了陌生的词汇，完全无从想象其背后的腥风血雨。在这陌生的世界里，没人知晓“我”所来自的东方国度，“我”的家国所经历的悲剧于他人而言不足一提，正是令“我”倍感寂寞凄凉的原因。

文革的作用在伍珍身上尤其深刻。与其他文本相比，反右、文革在此小说篇幅更长，色彩浓厚，是构成伍珍人物特色的重要元素。反右运动中，伍珍的父亲被视为右派，自此一蹶不振。母亲愤然离婚，她的继母是毛泽东思想支持者，以背语录和社论

为教育伍珍的方法，对文革期间发生的大小事都要上纲上线分析教训。伍珍自小深而彻底地浸染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致力于学习毛选，写心得与大批判稿，此后更随着上山下乡的热潮去了陕北农村，历尽磨难。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是伍珍的国内生活的基调，促成了她离婚堕胎的决绝之择，更是她留学后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便是在深入美国文化和生活之后，仍能见到反右和文革在她身上残留的余韵，且往往在她毫无戒备的时候冷不丁袭来，使她惶惶然生出时空错位之感（查建英，1991：208-209）。

中国封闭的社会体制和思想体系施加于留学生身上的阴影，使他们以赴美留学为出逃手段，而这种阴影往往来自于父母辈。〈最初的流星〉的“我”自小饱尝文革之苦，父亲因工作上与国外有联系而遭处死，母亲自此神经兮兮，异常敏感，对“我”的管束愈加严苛而趋于极端，严重束缚“我”本应享有的自由社交、恋爱的权利。在母亲的管制下，“我”只能穿戴保守的黑发卡和灰上衣。母亲对于国外的人事物更是异常排斥，严重干扰“我”的日常社交。西式舞会上，“我”猛然想起插队时的老农弓腰使锄头，想起农村灰褐的土地和抹鼻涕的孩子。这些反右和文革所遗留的似有若无的精神创伤，一直左右留学生的生活。在查建英巧妙的处理下，这些历史记忆以另类独特的形式浮现于文本中，和留学生的心境变化产生互动。

第二节 中国与美国，爱情与婚姻

以女性为主角的留学生文学，其中不乏爱情与婚姻的相关描写。这些留学生在异乡努力追求完满的爱情婚姻，但结局总不甚完美。爱情与婚姻往往与学业、工作、生

活等元素结合，集中勾勒留学生在异国受挫的经历，凸出他们在迷茫中的艰苦求存¹⁰，描述“她们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处处表现出和中国传统文化扯不断的纽带关联”（朱贝特，2016：18-19）。然，查建英的留学生的爱情对象往往跳脱框架，升华成一种更广义的符号，一种具备历史蕴意的集体印记，这些对象可以是典型而极为普通的平凡人（余宝发、小宁），可以是没有名字、形貌、身份和性格描述的（“D”），由此加深了他所具备的符号意义。

留学生在异域历尽艰辛挫折，体认到美国生活不如理想中美好的同时，也发现自己在美国难有真正的心灵依归。出于精神寄托及文化身份定位的迫切需要，他们转而投奔一度遗弃的祖国。伍珍在中国上山下乡时认识的知青余宝发，与伍珍的国内生活记忆交织在一起，是反右与文革的伤痛记忆与民族血缘的凝聚。余宝发与伍珍之间的结合，是伍珍与故乡的历史记忆的结合。她和余宝发的婚姻使她和故乡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出国留学使伍珍狠下心堕胎离婚，与余宝发/民族记忆决裂。出国后的她在学业、工作、生活、爱情上一再摔跤，日愈颓丧，其爱情历程尤为坎坷——她反复与不同的男人交往：落魄的山姆、性无能的约翰王……她在这段时间内付出精神和肉体，从原先保守的性爱观转变为自由开放的婚姻观，极力剔除身上的原乡印记，却造成了她与源根的精神疏离。爱情上的一再受挫终使伍珍崩溃，她在凄凉无助时几近饥渴地阅读余宝发的来信，无疑是在异域受挫后转而向故乡记忆寻求精神慰藉的一种本能。伍珍自以为果决地与前夫/历史记忆断裂，然她对余宝发的来信“活像一个溺水之人望着一

¹⁰严歌苓在《雪地上的星星》给罗梅卜安排了一段令她心驰神往的邂逅，看似是她在令人身心交瘁的课业压力中的唯一慰藉。最后在爱情上的彻底失败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罗梅卜对异国的理想完全死灭。

根漂浮的芦苇”的极度渴求，正是她在空虚迷狂时一再挖掘记忆深处的家国，试图寻求精神依归以强化文化身份的渴望。

这种精神慰藉的寻求在〈丛林下的冰河〉有了更进一步的叙述。小说中的“我”在留美数年后决心回国寻找昔日恋人，尝试再次建立“我”与民族血缘的内在联系。来自中国的“我”看似与其他留学生不一样，完全适应美国大醉狂欢的放纵生活。然而与美国男友捷夫分手之后，“我”突然想起故乡的恋人“D”，从而回到西北去寻求一切与“D”相关的线索。这种寻求不外是追溯曾经深植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血缘。“我”在寻求的过程中回望故国，一再以种种符号和意象表征对故乡进行重构，试图重新建立与家乡的精神联系，挖掘自己心中深埋的民族本质，因为“‘我’赴美留学虽然宣告了和‘D’的恋爱关系的终结，却并没有就此中断与‘D’的精神联系——‘D’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过去‘历史’的化身”（刘俊，2000：33）。

“我”早已认知到自己与捷夫的交情不会长久，意即“我”始终无法成功与美国建立内在血缘的联系，这份“先爱后离的情感经历”乃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欲拒还迎的心态折射”（李兴文，2007：82）。“D”是凝聚了民族记忆和历史记忆的结合体。“我”曾毫不犹豫地“D”断裂，遗弃了民族历史之纽带。但“我”无法将“D”彻底割离，意味着“我”始终无法摆脱身上的民族印记。“我”放弃与捷夫/美国文化的联系之建立后，便转而向故土记忆寻求依托，却发现“D”早已死于冰河之下。“我”对“D”寻求的失败，也是与历史的内在血缘再建立的失败。印度人巴斯克伦的命运和文本中出现的西方小说《丛林中的猛兽》，双双以不同的人生经历述说了同样的伤痛——与人生本质的生命意义擦肩而过。他们作为命运的败者，与“我”从拥抱美国文化到寻求家国记忆的挣扎过程交织在一起，无疑是对于“我”的生命悲剧的一种深刻

预言，他荒凉的结局正是“我”无可逃避的未来。但“我”始终没有发现巴斯克伦的种种暗示，从而失去历史重负，使生命徒留平淡轻虚。

“80年代初的留学生小说背负着历史的重负，国外的任何信息到他们这里都会归结到群体的意识上，他们永远摆脱不了中国，摆脱不了过去的那个阴影”（王丽亚，2012：58）。在查建英的留学生小说中，历史重负一方面形成留学生无法摆脱的精神创伤，一方面又促使他们不得不在受挫时呼唤故土，以求慰藉。这种家园情结乃是一种“重返母体”的现象，是人类“对归属、安全、爱护的期盼”（张卓，2010：61-62）。历史重负不仅是他们的伤痛，也是归属。在异域生活情境下所遭受的种种挫折，使这份重负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印记，是精神与心灵的原始依归。“我”对“D”的离弃，使“我生存的某种可能”、“某种理想与精神”永远地失落了。这些恋人在记忆中升华成故土历史的象征性符号，更是民族本质的表征。“我”急于追求异国冒险，却丢失了与家国历史的内在血缘。留学生与爱情的纠葛，正是他们与民族血缘和家国记忆在断裂与联系之间游移不定的挣扎。

第四章 文化失落——源根与异乡的拔河

文化失落与身份焦虑下产生的“边缘人”¹¹与“无根的一代”¹²是留学生文学永恒的课题。“只要在不同文化的冲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就会出现”，在异文化的冲击下，身份认同成了对生存而言迫切的问题（周宪，2007：248）。美国丰裕资源所建构的物质神话，以及故土家国的历史重负形成的双向拉扯力，使留学生面对文化身份的裂变，反复在东方与西方、源根与异乡之间游离悬荡，重复文化身份的破碎与重构，迷失了精神家园。她们无法从矛盾中逃离——“学习西方是对西方的承认和接受，是对自己历史的觉醒和对自己传统的叛离；但保持传统却是对西方的拒绝与抗衡，是对自己历史的确认和对自己传统的继承”（陈慰萱，1997：44）。这些个体境遇的悲剧命运，正是留学生群体流离异域的巨大寓言。

第一节 对异文化的迷茫、排斥与接受

¹¹ 边缘人（magrinal man），指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人，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 E. Park）在其论著《人类迁移与边缘人》中，基于长年对犹太民族的研究而提出了此一理论（转引自余建华，2006:53）。一说此概念来自于华裔学者李玫瑰（Rose Hum Lee）的著作《中国人在美国》，特指夹杂在两种文化、世界之间，受到双重乃至多重文化的冲击，产生认同焦虑，在文化心理上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人（转引自赵猗涵，2011：7）。

¹² 於梨华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通过主角牟天磊的塑造与描述，提出了“无根的一代”之概念。她在文本中指出：“Gertrude Stein 对海明威说你们是失落的一代，我们呢？我们这一代呢，应该是没有根的一代了吧？”（於梨华，1984:76）他们在台湾和美国共享“他者身份”，始终无法真正归属于任何一方，造成了“无根飘零”的处境，“无根的一代”成了留学海外的学子的代名词。（吴明，2016:8）

“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指一个文化的移入对原有的文化造成冲击，在演变过程中，导致原有文化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发生改变，甚至文化解体（deculturation）（参约翰·克拉尼奥斯卡斯，2002：102）。出国或留学域外是一种“跨文化”的翻译行为，通过“两种文化的对话与调整”而产生的新意识与体验，将导致留学生的“生存处境与身体存在方式跟传统形成某种的疏离”（辛金顺，2015：245）。

文本中，美国展现了第一世界的种种优越之处，然库恩的绝望自尽、巴斯克伦的抛妻弃子、在〈周末〉中孑然一身的“他”，都象征“西方精神理想的破产”，意味“逃离故乡，远在他乡的代价”（池雷鸣，2010：11）。他乡与故国对留学生而言兼具吸引力和排他性，“当中国留学生带着自己已经形成的文化结构进入一种全新的异质文化结构中去的时候”，则导致文化定位的“失调和失衡”（李倩，2009：13-14）。长久为东方文化所孕育的中国留学生，面对与民族价值观相冲的异域文化体系，他们或排斥或包容，从多方面展现了各异的姿态和反应。

美国虽提供了机会，许多留学生在接受美国资源的同时又深受其苦¹³。查建英所描写的留学生往往不同于此，他们没有民族意识的枷锁，对美国文化持开放欢迎的姿态，少有激烈抵触或抗拒。文本中排斥美国文化者多以不具名配角的方式出现，他们代表典型的、坚持纯粹东方文化而拒绝接受美国文化的留学生。〈丛林下的冰河〉的中国留学生同胞完全不能接受“我”与美国朋友亲密的招呼方式。在美国的派对上，面对的完全融入派对的“我”，他们只能“倚纱门而立，那神情如隔岸观火”。这不啻是

¹³白先勇笔下〈芝加哥之死〉的留学生吴汉魂，为求一纸文凭赴美六年，无法忍受异域与故乡的撕扯所带来的精神萎靡，最终在毕业那一晚自尽于密歇根湖。美国将他困在“克拉克街廿二层公寓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六年苦读徒余书架上那些“腐实幽灵”似的书本，他自己却失去了灵魂，其死亡的关键正隐藏于他的名字（吴/无汉魂）之中（白先勇，2000：247）。张系国在〈割礼〉中描写了留美知识分子的精神挣扎。面对保钓运动所带来的身份焦虑，他们以知识为屏障，投身于书中“冷凝的欢愉”（林润，2007：171）。现实利益使他们不得不屈服，失去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导致他们与原乡关系的裂变。

对美国文化的拒绝，亦是“高风亮节”的坚守，对“无耻洋化”的唾弃。他们迅速传开种种关于“我”的谣言：“比洋人还洋”、“给中国人丢脸”、“作风令人作呕”，充满轻蔑和藐视（查建英，1991：117-118）。可见在中国留学生主流群体里，任何具有“洋化”倾向的、对美国文化表示接纳附和的行为举止，往往被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背离，乃至对民族尊严的一种侮辱。

柴荣与芬原是对美国文化无任欢迎的代表。芬原作为带领“我”领略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否定中国一切以社会责任为根基的理念，而推崇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相较于“我”中国式的娇羞女儿态，落落大方的芬原在西式舞会里表现如鱼得水。他认同西式的生活理念，熟读西方文哲理论，知晓米勒的农民画、雨果的哲学，同时毫不遮掩对中国的厌弃：“中国算是没救了，都坏在这帮特权官僚手里，民主少得可怜，老百姓蠢而迂，民族的劣根性……”（查建英，1991：15）。芬原可说是西方形象在“我”心中的化身。柴荣则是个（自称）自由主义者，主张开放的男女关系，蔑视“中国留学生和进修学者的道貌岸然”，讥笑他们的自以为高尚：“其实他妈哪个没去看过性电影？”又对中国人的固步自封表示荒谬：中国人的脑袋瓜儿“除了孔夫子和共产主义”便塞不下其他东西（查建英，1991：239）。

相较于芬原与柴荣，〈芝加哥重逢〉的男子小边显然与美国文化格格不入，他总想起中国大学的美好时光，美国的公寓住所是他孤独沉思的象征。留学生虽为了美国梦不远千里来到美国，但与美国文化的对峙使他们难以融入社会主流。留学生“试图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中完成对自己精神家园的重构；他们企图在丢失了自我之后重建并超越自我”（吴爱萍，1995：39），但美国语境下的“他者”（the other）身份使其无法融入西方异质文化的主流，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上（赵漪涵，2011：12）。这筒中的撕扯与拉锯使他们悬浮在双重世界的边缘，被放逐在文化的隙缝中。

值得思考的是，查建英在描写这些歧视与自卑时，仍是基于中国人的视角，比起刻画“美国人眼中的留学生”，更近似于“中国人眼中的留学生”。很多时候，留学生本身所感受到的排斥和伤痛，很大部分来自于同为“中国人”的群体。当地的美籍华裔移民，甚至是同为留学生的同胞们，给他们带来更多欺压和瞒骗。即便身在美国，许多留学生仍逗留在华人圈子，他们的故事诠释并非采用完全的西方语境，而是通过中国人的视角自我审视留学生的形象。留学生在美国社会所展现的自怜自艾，正是源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的自我贬低。查建英早期留学美国时所写的短篇小说也与主流留学生文学相似，多是“浮光掠影的西洋景……快速地捕捉一组画面、一种情绪氛围、一些人物素描”，对异域社会文化的思考不深（江少川，2014：77）。当她创作以留学生的精神挣扎为主轴的小说时¹⁴，实已离开美国而重返中国，回到“接地气”的母语环境（河西，2014：32）。查建英在书写这些留学生文学的时候，不排除有中国语境自然融入的可能。通过对留学生文学的剖析，更多的是对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映。

她从中国语境出发，以中国社会内部视角审视这些留美生，甚至是审视美国人、美籍华裔、以及留学异国人，构成了她独特的留学生世界观。从不同语境看待留学生，其反映的真相的“失真”是无可避免的。毕竟“失真恐怕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存在”，且往往带有理想化的迹象（查建英，2006：94-95）。即便是从中国语境看待中国留学生，有了相异经历、地域、视野的滤镜，所理解的也未必是留学生的现实。当然“现实”为何，在不同视角之下又有不同的诠释和理解。

¹⁴ 〈芝加哥重逢〉、〈头版新闻人物〉创作于1986年，〈丛林下的冰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创作于1988年，〈献给罗莎和乔的安魂曲〉创作于1989年。

第二节 身份焦虑：悬荡于双重世界的夹缝之间

留学生对身份认同的追寻，意味着“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一种有关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周宪，2008：188）。当留学生长期处于与东方相对的西方异质文化结构中，发现自己的文化体系与当前社会产生矛盾，导致身份认同发生裂变时，便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认同产生强烈诉求，促使他们重新反思自己的社会定位，试图消弭文化的剧烈冲突中所导致的心理矛盾。

“当个人或群体移居异域或者与一种异质文化正面相逢时……彼此的风度（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体系迥然不同甚至产生冲突和对抗，身份认同问题便从隐性位置走到了前台”（蔡晓惠，2014：31），从而导致了身份焦虑。当留学生失落了民族文化，又放弃了与异质文化的融合，迷失了精神家园又无以重新建构之，便成了文化夹缝中的流浪者。

伍珍作为美国文化的推崇者，为求得绿卡，不惜抛弃固有的民族价值观，积极融入美国社会。伍珍表现了中国学生身处美国社会体系的突兀——她恨自己“老记不住跟老美必须直来直去”，仍改不了中国人委婉迂回的处事方式，以至于在学业工作处处碰钉。美国习俗难以融入，故乡文化又令人无法接受：伍珍参加一场留美中国文人的聚会，发现自己在政治、文艺圈子皆有隔阂。饭局上一批文人此起彼落的言语论战中，不断出现中西文化表征的冲突：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拿破仑和忽必烈，也有流落美国社会边缘的中国人的挣扎：“跑到别人国家来当三等公民”虽委屈，但“回去连五等公民都当不上”，毕竟“中国人作践起自己人来能比洋人毒上十遍”，于是流落

在美国的他们陷入“一瓶子不满，两遍晃荡”“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窘况，反映留美中国人进退维谷的困苦，亦是对失根状态的辛辣讽刺（查建英，1991：222）。

伍珍崇拜美国丰裕物质，又无法与原乡决裂。与余宝发的离婚手续办妥后，她虽因（自以为）抛却了家国记忆的负担而感到轻松，但余宝发信上所记述的家国琐事又使伍珍产生回到中国陕北的空间错位。她迫于现实因素而抛却中国式的婚姻和节操观念，余宝发的爱情却成为她衡量性爱的标准和楷模。伍珍想要找一个美国丈夫，山姆的落魄与约翰王的欺骗使她对美国的精神理想幻灭，伍珍由此转而向故乡（余宝发的信）索求理想。就其结果而言，这种索求是失败的。她发现自己最后一无所有一一因约翰王而失去肉体，又失落了余宝发的爱情，在美国没有归属感，又失落了中国的精神家园。“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与融合下，个体根据已有的文化意识进行文化心理及行为的调整”，为了异中求同，就必须对文化进行融合与重组（徐芳，2016：86）。伍珍作为一个极力自我“美国化”的中国人，价值观、爱情观不停向美国靠拢，骨子里却烙印深刻的家国历史，阻碍了她与异质文化的结合，使文化融合走向失败。伍珍在美国所遭遇的悲剧，是中西文化结构剧烈冲突下的结果。文化上的无所依归让她产生身份认同的焦虑，使她始终游离在不同文化之间。

“伍珍的境遇是一个民族或者集体的代码，其生活命运是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存在的总体命运结合。她的全部困境来自无法‘进入’文化，她不是自愿疏离或反文化的‘反英雄’，而是试图顺应却又无能为力的局促的人。她的麻烦在于脱离了第三世界的处境，但却不能真正融合到第一世界的文化中去。”（陈薇，2009：119）

与伍珍相比，〈丛林下的冰河〉的“我”在异域社会的适应方面全无障碍，似乎是个全然美国化的中国人。然，“我”虽期盼做个疯癫西洋人，却仍是在用汉语在思考；“我”看着美国的一景一物，脑海中浮现的是中国文化符号：美国南方小城的闷热比对“红泥小火炉”，西洋摇滚乐比对杜甫诗句。文本中的巴斯克伦作为“我”的未来的预言性存在，他对归属的游移不定出自于文化认同的焦虑，所反映的正是“我”内心深处对美国文化的茫然。

“我”和捷夫/美国的分手是中西对峙的结果。“我”期望依靠与捷夫的爱情使“我”与美国文化重建和谐联系，记忆中的家国历史却始终阻碍着双方的融合——“卖山楂糟、江米条的老头儿。大雪中飘扬中静止不动的飞檐流瓦……支援麦收时农民孩子跑抛过来的花蛇皮。D。冰河。D。”（查建英，1991：135）一连串的故乡文化符号，意味着我对家国文化本能的渴望。美国始终不能满足“我”对身份定位的需求，导致“我”放弃了与美国文化内在联系的建立，转而藉着对“D”的寻求试图重构身份认同。但“我”惊觉自己与故乡之间的疏离：物质条件的落后、社会风俗的封闭，朋友之间没了话题，父母因“我”穿着背心见客而对大怒——本应熟悉的故乡“成为一片陌生和疏离的空间场域。从物质上到精神上，中国都成为异质的‘他者空间’”（蔡晓慧，2014：79）。种种迹象导向了我对“D”寻求的失败，美国与中国都不是“我”的归属，从“我”放弃“D”的那一刻，就是文化认同焦虑的开始。

长年的西方生活经验使留学生对“西方/异域”和“东方/故乡”的认识产生变化，故乡与异域或将成为不同的符号（查建英，2006：68）。家国（历史）和异域（现在）对留学生而言兼具吸引力与排他性，他们始终无法成功与任何一方共融并建立内在血

缘联系，任何一方也不曾认同其为同类，由此造成了身份解构的危机与焦虑（郭群，2007：462）。文化作为个体之间的粘着剂，不仅影响群体对个体的认同感，更强调群际关系的协同性（邢媛，2017：106）。为了融入异国，他们势必要疏离故国文化，骨子里的文化浸染和民族意识又使他们无法顺利与异质文化达成内在的和谐状态，由此产生了身份定位上的分裂和矛盾：我属于中国？美国？抑或二者皆非？查建英借〈芝加哥重逢〉中的“我”表达了这种拉锯之苦：

“在异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性格和感情会逐渐发生一种分裂，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变化。两种文化会同时对你产生吸引力和离心力，你会品尝前所未有的苦果，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矛盾。你的民族性在减弱的同时，你的时间性在把你推上一片广阔的草原的同时，使你面临孤独的深谷……”（查建英，1991：31）

查建英所描写的这些留学生的个体境遇与精神悲剧，无疑是流落异域文化而无所依归的集体民族代码。在他们身上，中西文化的对峙受到尖锐而深刻的凸显，文化归属的失落与身份认同的裂变将他们推往双重世界的夹缝，失落了文化认同的立足点。这种精神上的焦虑和矛盾演化成内心的寂寞和痛苦，恰如〈丛林下的冰河〉的“我”在最后醒悟巴斯克伦的警告：找到的就已不是你所要找的。留学生抱着理想来到美国，却不得不以认同的裂变与家园的解构作为代价。他们处在异质文化与家国记忆的撕扯中，面对文化认同的矛盾，反复在身份定位的裂变与重构中游移，既无法背离源根文

化，又无法抗拒美国的理想。掏空了民族印记之后，其所面对的结果，正是“我”所畏惧的——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和理想之后，一种无以挽回的生命的轻虚与空洞。

第五章 结语

作为时代趋势的产物，查建英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记录了随着第三波留学潮而远赴美国的留学生真实的生活体验与精神轨迹。然她的作品基调与那些艰苦求存的留学生书写并不相同，更多的是一种初生之犊的无畏无惧，渗透了她当年留学时的冲劲，是留学生文学中众多书写中的一类。留学生文学是她的真实体验与一定程度上的文学修饰效果的产物。伍珍作为她笔下的一个特例，更近似于留学生典型形象与文学叙事技巧的相结合，而非全然来自于她的真实经验。伍珍在美国历尽坎坷，与查建英相对自由丰足的生活并不一致。但她也同样在初至美国时对英文感到棘手，〈丛林下的冰河〉的“我”所体会的挣扎，也是查建英“在中西文化、不同价值观之间游走、彷徨、困惑的感受”的真实反映（查建英，1991：77）。这简中所流露的个人真实感受是无以磨灭的。

她通过留学生爱情的书写，将爱情升华成富含民族与历史蕴意的符号，从而探究留学生与家国血缘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反右运动与文革的阴影成了一种精神创伤，然它对于留学而言，确实是构成家国与民族的重要的一部分。刻意除灭身上的国家印记，反而使他们与家国产生疏离。历史重负对这些留学生而言虽然成了他们在第一世界寻求理想的负担，却也缔结了他们与故乡之间内在血缘的联系，让他们在异质文化中踏实地踩在土地上，使生命不至徒留轻与虚。若将家国记忆尽数掏空，反而使他们身处双重文化的剧烈撕扯中，失去身份定位的方向与归属，迷失精神家园，导致文化认同的裂变，成为文化上的流浪者。

对这些苦于无法将美国视为心灵归属，又失落了故乡的精神家园的留学生而言，美国梦成了一个矛盾。然，这些漂流海外的留学生是否必须永远对出生地表示忠心？抑或能坦然认同异域为其精神依归？又或者，他们是否能达致一种平衡，坦然游移在双重世界之间，对自己“边缘人”的身份表示认可与接受？对查建英而言，即便可能遭遇身份裂变的危机，留学带来的深刻的危机与失落感却是十分可贵的，使她们埋首于不停的自我发掘和重生，而那些“把自己包在一层壳里，钻进唐人街或赶快打道回府”的群体，自然不会有危机、摔跤和丢脸的机会，也不会有重生了（查建英，2006：80）。因个人的选择而游离在双重文化夹缝中的“边缘人”生存状态，又何尝不是一种可贵的自由。毕竟对查建英而言，选择的自由所导向的结果不一定完美，但她还是坚决要这个自由。

引用书目

一、 专书

1. 白先勇（2000），《寂寞的十七岁》，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2. 参约翰·克拉尼奥斯卡斯著，季民忠译，《翻译与跨文化操作》，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3. 曹文轩（2003），《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 查建英（1991），《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北京，作家出版社。
5. 查建英（2003），《留美故事》，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6. 查建英（2006），《八十年代访谈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7. 逢先知，冯蕙主编（20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8. 林涧 主编（2007），《华人的美国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9. 钱刚鐔（1983），《中共外交政策与策略》，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容闳原著，张叔方补译（1981），《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1. R. 麦克法夸尔编、谢亮生等译，（1998），《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2002），《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次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13. 司各特编著，蓝仁哲译（1983），《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重庆：重庆出版社。
14. 宋晓英（2016），《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 王德威（2012），《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城邦文化出版社。
16.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2005），《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7. 王先霈主编（1999），《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8. 辛金顺（2015），《中国现代小说的国族书写——以身体隐喻为观察核心》，台北：秀威资讯科技。
19. （美）徐中约著，计秋枫、朱庆葆译（2008），《中国近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20. 杨启平（2012），《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台北：新锐文创。
21. 叶维丽著、周子平译（2012），《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2. 於梨华，（1984），《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
23. 周宪（2007），《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4. 周宪（2008），《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北京：中华书局。

二、 期刊论文

1. 陈薇（2006），〈文化边缘的游离与抉择——析查建英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第23卷第6期，页119-121。
2. 陈薇（2009），〈再论美国华裔文学的身份和属性——以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为例〉，《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页118-120。
3. 陈慰萱（1997），〈困惑与选择：在两个世界之间——美籍华人女作家查建英、谭爱梅、於梨华小说分析〉，《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页38-44。
4. 郭群（2007），〈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异化——论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东北大学学报》，第9卷第5期，页461-465。
5. 河西（2014），〈专访查建英：依恋八十年代〉，《留学生》，2014年第14期，页30-33。
6. 江少川（2014），〈“找到的就已不是你所要找的”——查建英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第1期，页76-80。
7. 李兴文（2007），〈美华文学中的意象建构——以《背影》和《丛林下的冰河》为例〉，《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第27卷第6期，页79-83。
8. 刘俊（2000）〈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南京大学学报》第6期第37卷，页30-38。
9. 彭远（2017），〈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探讨〉，《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页132-136。

10. 孙慰川（1994），〈华人留学生文学的起源、发展与现状〉，《文教资料》1994年03期，页48-50。
11. 唐翼明（1989），〈一个“留学生文学”热正在兴起〉，《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第4期，页85-86。
12. 邢媛（2017），〈论文化认同的三种主要形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34卷第4期，页102-107。
13. 徐芳（2016），〈民族文化认同内涵及基本结构分析〉，《新西部》2016年第14期，页85。
14. 王宁（1999），〈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页48-51。
15. 王少杰（2005），〈留学生文学：定义和区分〉，《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6卷第1期，页50-55。
16. 余建华（2006），〈国外“边缘人”研究略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页54-57。
17. 吴爱萍（1995），〈独在异乡为异客——海峡两岸留学生文学的“家园意识”〉，《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第16卷第2期，页34-40。
18. 张颐武（1989），〈第三世界文化的生存困境〉，《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05期，页26-32。

三、 学位论文

1. 蔡晓慧（2014），《美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与身份认同》，未出版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天津。

2. 池雷鸣（2010），《探索与追寻——异族叙事视野中的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广州。
3. 何颖利（2001），《二十世纪留学生文学的家园情节》，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郑州。
4. 李倩（2009），《失根·寻根·生根——於梨华留学生小说主体论》，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5. 刘杨（2002），《论中国大陆留学生文学的主题嬗变》，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长沙。
6. 默崎（2017），《美华文学和“美国梦”叙事研究》，未出版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7. 王亚丽（2012），《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论北美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写作》，未出版博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8. 张卓（2010），《跨文化交流与当代留学生文学研究》，未出版博士论文，吉林大学，长春。
9. 赵猗涵（2011），《新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研究》，未出版博士论文，辽宁大学，沈阳。
10. 朱贝特（2016），《新移民文学婚恋题材小说论》，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长春。
11. 朱美洁（2013），《跨文化语境下 20 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形象研究》，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重庆。
12. 吴明（2016），《论於梨华留学生文学创作的主题嬗变》，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南昌。